

嘉庆《大清一统志》： 古代中国最后一部官修地理总志

□ 李金飞

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史书纂修，从体例到内容不断进行丰富与完善。一统志是传统舆地总志的新发展，元朝所修《大元大一统志》开一统志体例先河，明朝沿袭，纂成《大明一统志》。清朝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共成三部《大清一统志》。嘉庆一统志是古代中国最后一部官修地理总志，也是一统志体例的历史终结，在内容上集历代大成，记载了自清朝兴起至盛世期间国家疆域的变迁，特别是边疆地区如何被纳入到中国疆域版图中的历程，蕴含着鲜明的“大一统”意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一）

嘉庆朝决定重修《大清一统志》，最初是为国史馆正在撰写的《地理志》作参考。当国史馆调来已经成书的乾隆一统志时，却发现该书在内容上存有诸多错误、缺漏，“编辑不全，殊难移交作为根据”。因此，拟对乾隆一统志展开“纠旧误”“补旧阙”“续新篇”的三项工作，这实际上催动了一部新一统志的纂修。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三月，国史馆立即拟订章程，敦促迅速办理，“立限二年，将全书纂校刊刻”。当时国史馆正在编纂国史表、志、传诸书，再无暇兼顾，因此，从内阁、翰林院中选派专门史官负责。但是，在整个一统志编纂过程中“史无专官”的特征较为明显，出现了史官频繁更换的现象，“升迁离馆，更换不一”。然而，每易新史官，势必要对文本内容逐条复检，这就在客观上严重影响修书进度。

就国史馆内所设各职来看，可谓分工明确、协作进行。总裁、副总裁由皇帝极为倚重的高级官员担任，全面主持管理并上奏馆内诸事。提调官负责馆内一切具体事务，如督促史官功课、汇报修书进度等，“专责于提调”是对其职权之真实写照。纂修官是志书文本书写的核心力量，根据需要，上设总纂官，负责审核体例、考订缺讹、详查书稿；下置协修官，是为纂修官的替补人员，直接参与稿本书写。馆内同时有校对官、誊录官、收掌、承发、供事等，是为一统志的佐修人员。国史馆还制定了考勘、功课、桌饭银两、议叙等制度，用来约束和鼓励各官。完善的史官职掌与系统的管理制度成为一统志成书的重要

保障。

一统志在编纂过程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那就是各省对方志资料一再拖延。作为官修地理总志，一统志资料选择自下而上的获取方式，所谓“修志之役，必始于县”，县志汇集为府志，再将其辑为省通志，最后才汇编成一统志，调集全国的方志资料也就成为决定一统志成败的关键环节。一统志纂修之初，国史馆就行文各省，要求将资料“半年内全行送馆”，这显然是对搜集难度的严重预估不足，至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依然是“各直省未咨送者甚多”。面对诸省的“因循积习，视为具文”，国史馆总裁托津表示一统志工作“碍难办理”，这也致使在嘉庆朝近10年时间内都未完成。道光帝登基后，尽管一统志已经纂修过半，但依旧存在着“其余尚因外省文册未全，不能一律全竣”的拖延现象，于是，道光帝敕令各省要在半年内呈送资料完毕，两年内成书，显然，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一统志纂修时间持续如此之久，这是国史馆在开馆之初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的。

实际上，根据一统志文本进呈给皇帝御览的时间来看，主要集中在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十二月之后。直至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十二月，一统志稿本才最终完成，共历时31年。此后，又进行了诸多校改、修订，交武英殿刊刻，所有工作宣告完成。

（二）

嘉庆一统志含正文560卷，凡例、目录2卷，记载了从开国初沿至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全国疆域的信息。一统志按照地域把全国划分成“统部”，逐一记载各地内容。除京师外，共有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18个统部，另设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边疆三统部，用来对“三北”地区进行系统书写。

蒙古统部地域“东接盛京、黑龙江，西接伊犁东路，南至长城，北踰绝漠，袤延万余里”，这与乾隆一统志“旧藩蒙古统部”所载相同。统辖地区也是对“新旧藩蒙古统部”29地的全部继承，仅是把乾隆一统志独立成编的西藏列入其中。“新疆统部”所辖

30个地区是在完全合并续修一统志“西域新疆”“新疆藩属”基础上，补充了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吐鲁番、玛尔噶朗、那木干、布哈尔。鉴于乌里雅苏台在整个西域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单独设一统部进行书写，下辖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三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边疆地区实际上早在乾隆朝就已完成统一，此后并未发生大变动。嘉庆一统志只是进一步将其明确下来，因此，整个时间沿革下限也多与旧志相同。从其记载统一的内容来看，也多集中在建城、设官、内附三个元素上。

一统志每一统部下，又按照“类目”对该地详细进行书写。就总目来看，共有27类：表、图、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康熙、乾隆两部一统志“仿前明李贤所撰统志之例”，并不设盐课、关税专条，因此，此次重修，“税课”是为首创，以彰显清朝税收法制修明、规条详备。但税课仅出现在各省统部中，边疆三大统部却不见任何踪迹。

事实上，一统志为实现对边疆地区特殊情情的记载，在总目基础上又有意进行了诸多细目的调整。蒙古统部以建置沿革、山川为基，外加古迹、陵墓、祠庙、寺观、风俗、土产等不一，并设置了旗分、封爵、驿站、度漠驿站等。新疆统部与乌里雅苏台统部也根据当地实际设置了封爵、暑度、属境、台站、卡伦、营塘、属部等。得益于总目与细目的相配合，把国家疆域版图上最为丰富的地理信息完整展现出来。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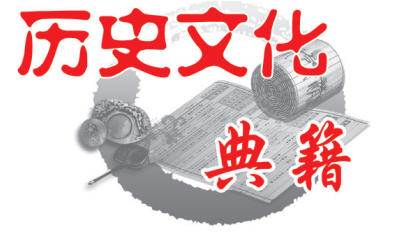
嘉庆一统志是“大清即中国”的历史记录，反映出清朝具有鲜明的中国意识。一统志在书写每一地区时，“建置沿革”成为必设类目，以此阐明该地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历史沿革关系，最后在叙述与清朝关系之时，直接以“本朝”自称开始。这表明清朝是把自己当作历代中国王朝的延续。一统志在书写清朝与朝贡诸国关系时，又自称“中国”，且每论及一国，开篇即考证该国何时与中国“相通”，显现出清朝是以中国身份与外国进行交往，表明清朝与历代王朝一样是中

国历史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新清史”极力宣扬的“清朝是满洲帝国”之言纯属谰论。

嘉庆一统志重塑起中外有别的新“四夷”观，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业已开始酝酿。清朝自入关后，为实现王朝“正统”，一直努力淡化边疆“四夷”意识。特别是随着疆域“大一统”的实现，“四夷”不再是边疆的附属者，已与内地各民族混杂在一起，边疆内地一体化成为“大一统”王朝中的重要现象。

嘉庆一统志描绘出清晰的王朝疆域和边界，中国版图最终底定。中国历代王朝为宣示统治的合法性，在官修史书中往往利用分野来书写疆域。清以前形成了“九州分野”的书写体系，但清朝辽阔的疆域动摇了分野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分野书写鞭长莫及。嘉庆一统志为弥补分野的局限性，专门使用暑度来书写新疆统部、乌里雅苏台统部以及所辖地区。暑度所用元素主要有：北极高度、距京师偏西、夏至昼长与夜长、冬至昼长与夜长、春分秋分长。与分野相比，暑度对疆域书写极为精确，这在明晰疆域实体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根据乾隆一统志记载，“新疆统部”并未有涉及“西至”“撒马尔罕”的任何相关记载，因此，这是一模糊位置。但嘉庆一统志“新疆统部”却用暑度记载了新的“西至”“右哈萨克”范围：“北极高四十三度至四十五度，距京师偏西四十五度四十八分。”也是因为暑度的使用，清朝才有了明确的疆域实体，传统模糊的天下观也被清晰的疆域观所代替。

作为中国最后一部一统志，嘉庆一统志的编纂历经曲折，是对清朝完成边疆统一后的最终疆域书写确认，呈现了中华民族版图鼎盛时期的景象，成为“大一统”国家的真实记录和历史见证。嘉庆一统志确定的疆域版图也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成为当代坚守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历史依据。



（上接1版）坚持把信访积案化解常态化作为推进源头治理的重要内容，集中交办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做好解疑释惑、督查督办、回复回访等工作，下力气减少群众重复信访，提高一次性化解率和群众满意率，不断完善解决群众利益诉求的长效机制，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积极做好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了解民情、汇集民智的重要机制，是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信访工作条例》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主动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我们要坚持把做好人民建议征集作为深化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突出向民心要治理效能，聚焦党和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加强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办理机制，丰富征集网络，拓宽征集范围，加强宣传引导，促进成果转化，发挥“民意直通车”优势，提升建议征集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人民建议质量，广泛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

坚决有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更加高效地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有为做好信访事项办理、矛盾协调化解、风险隐患排查、信访秩序维护等工作。畅通和规范信访渠道，充分发挥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用好信、访、网等立体化渠道，创新视频接访、干部下访和联合接访等方式手段，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途径就近就地反映诉求，扎实做好受理办理、督查督办、回复回访等全流程工作，依法高效推动解决群众信访问题。加大重点领域突出矛盾化解力度，发挥好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坚持“系统抓、抓系统”，强化政策供给和跟踪督促，不断提高信访问题解决质效，坚决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驰而不息推进作风建设,为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做好全年信访工作，必须把加强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围绕推进“135”工作部署，以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进一步扛起政治责任，坚持守正创新，解决突出问题，勇于攻坚克难，在推进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的实践中勇立潮头、再创佳绩，努力向党中央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

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好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信访工作而言，无论是推进信访问题源头治理，还是常态化化解信访积案，都需要加强调查研究，接地气、听民声，及时发现问题不足，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全面提升工作质量。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主题教育关于调查研究的部署要求，以巩固深化近年来持续开展“大督查大接待大调研”活动为着力点，坚持调研开路、调研开局，紧紧围绕党中央明确的重点调研内容，特别是信访工作存在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短板瓶颈，组织信访系统党员干部主动到情况复杂、矛盾突出的地方通下情、办实事，通过开展破解复杂难题的对策性调研、典型案例的解剖式调研、推动落实的督查式调研，真正把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突出问题化解好，把地方创造的新鲜经验总结好，把困扰基层工作的难点弱项弥补掉，转化为改进工作、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和务实举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

大兴改革创新之风。此次机构改革赋予信访部门新的领导机制，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决不能墨守成规，必须切实突出问题导向，向改革创新要动力。要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引领信访事业发展的关键一招，顺应时代发展新形势新任务，主动打破思维定势和工作惯性，鼓足闯的勇气、迈开试的步伐，加快转变信访工作中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工作方法，围绕新情况新问题研究提出新办法新举措，更好地发挥信访制度的独特政治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在服务党和国家大局中彰显时代担当、筑牢民心根基。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做好信访工作，面对人民群众，处理矛盾问题，来不得半点虚功，必须坚持老老实实做事，不断强化实干和担当，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我们要坚持以求真务实为工作导向，突出千字当头、实字落脚，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积极主动地在化解问题、防范风险、维护秩序等急难险重任务中，打硬仗、克难关、治顽疾，在实打实、硬碰硬的斗争历练中经风雨、壮筋骨、长才干，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要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让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干部得重用有发展，在信访系统进一步凝聚形成崇尚实干、力戒空谈、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为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

宁戚与齐桓公的故事

□ 刘俊莹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蜂起、战乱频仍，有多少英雄豪杰奋力争霸，欲称雄天下，演出了一幕幕慷慨悲壮的历史活剧。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些小人物以自己的智慧、勇气和眼光，成就了令后世称道的业绩，宁戚便是其中的一位。

宁戚饭牛

据道光《济南府志》记载，宁戚本为卫国（今河南卫辉）人，本是一个毫无背景的穷小子，他听说齐桓公不拘一格招纳天下贤才，就想去拜见齐桓公谋个一官半职。因为实在太穷，连到齐国去的盘缠都没有，于是他找到一个去齐国的商队，为商队赶牛车，这样才勉强到了齐国都城临淄。商队到临淄的时候天色已晚，城门已经关闭，无法进城，一行人只好在城门外露宿。恰好这天晚上齐桓公到郊外迎客，城门大开，车马随从簇拥而出，火把照亮了城门，也惊动了不远处正在喂牛的宁戚。宁戚想这是拜见齐桓公的好机会，但这种情况下又不能贸然前去，免得被当成刺客杀掉。情急之下，宁戚拿起木棍击打牛角放声高歌，希望以此引起齐桓公的注意。康熙《章丘县志》记载了宁戚的那首《饭牛歌》，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

适至豸，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意思是说，南山的石头斑斑驳驳，上好的白石反而枯烂，可怜的我啊就像那白石一样生不逢时，没有遇到尧舜那样的圣明帝王。身上的短布单衣勉强能够遮到小腿，从傍晚晚牛一直喂到了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才能天亮呢。果然，齐桓公听到宁戚的歌声对手下说：“异哉，歌者非常人也。”于是就命令手下把宁戚请到车上，一并回城。当天晚上，宁戚觐见齐桓公，向齐桓公讲述了如何治理齐国，第二天又向齐桓公讲述了如何称霸天下。齐桓公听了之后大为高兴，决定重用宁戚。此时群臣进谏说：宁戚是卫国人，卫国距离齐国不远，不如先派人去卫国考察一下宁戚的品行，然后再做决定。齐桓公说：不必了，如果派人去考察的话，难免会了解到宁戚的一些小缺陷，因为这些小缺陷而忘记了他的大才干，这就是人主与天下英才失之交臂的原因。于是齐桓公力排众议，任命宁戚为齐国大夫。

宁戚使宋

据光绪《东阿县乡土志》记载，公元前681年冬天，鲁庄公与齐桓公、宋桓公等诸侯国君在柯地会盟。柯地当时是齐国之邑，在今东阿县境内。会盟之后，宋桓公随即背叛盟

约。于是公元前680年，齐桓公就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陈、曹、单等诸侯共同讨伐宋国。宁戚进谏齐桓公说：“公侯虽然是奉天子的命讨伐宋国，但是胜之以兵不如胜之以德，不如先让臣出使宋国，劝说宋公与齐国讲和。”齐桓公大喜，于是就派宁戚出使宋国。拜见宋桓公之后，宁戚首先向宋桓公指明了宋国当前所处的不利形势。就国内局势来说，宋国目前正值大乱之后，国内政局尚未稳定，不宜与诸侯结仇。原来公元前682年，宋国将领南官长万杀死宋闵公，另立公子游为新君。宋国公族不服，赶走南官长万，杀死公子游，共同拥戴宋闵公的弟弟御说为新君，也就是现在的宋桓公。宁戚认为，宋桓公新继位，首要任务是平定内乱、整理国政，而不是与周天子以及各个诸侯国为敌。就国外局势来说，齐桓公是奉周天子之命主持天下诸侯会盟，宋国参加会盟于前，又背叛盟约于后，这种行为既违背了周天子的命令又失信于天下诸侯，因而不待交兵而胜负已分。听了宁戚的话之后，宋桓公为之愕然。见宋桓公被说动，宁戚趁机建议宋桓公与齐国讲和，重修盟约。宋桓公权衡利弊之后，遣使与宁戚一起觐见齐桓公，宋齐重归于好。于是，齐、陈、曹、单等诸侯从宋国退兵，各国相约择期会盟。据《鄆城县志》记载，公元前680年冬天，“单伯会齐

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鄆”，此次会盟即是宁戚极力促成的。宁戚初为齐国大夫，就能出使宋国立下大功，不战而屈人之兵，他的胆识与智谋赢得了齐国朝野的赞赏。

助齐称霸

据康熙《平度州志》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开垦土地，积聚粮食，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发展农业，这方面我不如宁戚，请您立宁戚为大司农，让他主管农业生产，与我一起辅佐您。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立宁戚为大司农，齐国农业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具体来说，宁戚对齐国农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宁戚秉承管仲“用优质金属铸造武器，用劣质金属铸造农具”的理念，大量铸造金属农具，在农业生产中推广使用铁犁铧，用铁犁牛耕代替木犁人耕，大大促进了齐国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宁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并完善发展了管仲制定的“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政策，既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确保农民安心生产，从而达到促进农业发展、稳定国家税收的目的。所谓“相地而衰征”，即根据土地的肥瘠程度等因素分等级征收农业税，这是管仲为齐桓公设计的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方案之一。宁戚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管理实践中，发现“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政策尚有欠缺，比如年景的好坏对农民的收入有着巨大影响，而他主张在土地肥瘠程度的基础上增加年景因素综合决定税收的标准，这就使得齐国的农业税更加契合农民利益，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管仲“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政策因为触碰了齐国贵族的利益而遭到部分贵族的抵制，为了将这一政策贯彻下去，宁戚不惜杀一儆百，严惩抗税不交的齐国大夫伯氏，从而确保了这一政策的顺利推行。在宁戚等贤臣的辅佐下，齐桓公终成霸业，宁戚也因而被齐桓公誉为“齐国之栋梁，君臣之楷模”。

据光绪《山东通志》记载，宁戚城在章丘县旧治绣惠镇东北二十五里，齐大夫宁戚采邑。但宁戚家却在胶水东岸，即今平度市马戈庄镇境内。据光绪《平度县乡土志》记载，这是因为齐国征伐东莱，宁戚死于行军途中，士兵用战袍裹土筑成此家。1984年，宁戚冢被列为青岛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